

【现代专门史研究】

论“死硬派”记者甘露德《中国之病》及其反响

李 珊

【摘 要】《字林西报》的美国记者甘露德(Rodney Gilbert)被认为是在华西人中“死硬派”的代表人物。这种印象的生成与其在国民革命时期出版的英文著作《中国之病》密切相关。甘氏宣称该书旨在“给中国挑毛病”。为此,他从中国的历史文化、中国人的民族特性及既往的中外关系等问题着手,批评中国人是“缺乏管束的小孩”,并认为列强不应继续纵容中国人民民族主义情绪的高涨。该书出版后遭到来自在华外侨和中国人的双重批评。在华外侨认为该书的刻薄口吻和露骨干涉中国的论调将惹怒中国人。中国读者中,基督教知识分子罗运炎以甘氏侮辱民族尊严为由要求政府将其驱逐出境,此事还在《字林西报》中引发中外读者的一番争论。学者夏晋麟则从中国人自身的视角对中国的问题展开反思。该书出版后引发的争议折射出五卅运动之后西方对华观感的复杂光谱,也反映出国民性话语与国人高涨的民族主义的正面碰撞。

【关键词】“死硬派”;甘露德;《中国之病》;国民性;民族主义

【作者简介】李珊,历史学博士,中国社会科学院近代史研究所助理研究员(北京 100101)。

【原文出处】《史学月刊》(开封),2021.11.66~80

林语堂在《吾国与吾民》(My Country and My People)的序言中曾经写道:“有一个赫德,便会有一万个甘露德;有一个罗素,便会有一万个伍德海。”^①在他看来,号称“中国通”的外国观察家中极少有人能够理解中国的生活方式,因而他们对中国人的描述都显得一成不变且乏善可陈。那么,甘露德是何许人呢?罗德尼·扬克斯·吉尔伯特(Rodney Yonkers Gilbert, 1889-1968),中文名甘露德^②,出生于美国宾夕法尼亚州,长期担任《字林西报》驻北京记者。在20世纪20年代中后期中国炽烈的反帝浪潮中,甘露德因其维护在华西人特权、反对民族主义运动的立场,而被视为在华西人中“死硬派”^③的代表。时人认为,甘露德“思想几全为帝国主义所束缚,故其所发之议论,十九皆不利于中国”,并将他和《京津泰晤士报》(Peking & Tientsin Times)的主笔伍德海(H. G. W. Woodhead, 1883-1959)所撰文字视为仇英运动的“罪魁中之罪魁”^④。1926年,甘露德出版了《中国之病》(What's Wrong with China)^⑤一书。同年11月,正在英国游历及讲学的胡适在英国皇家国际事务研究所作题为“中国的文艺复兴”的演讲,听众中有一位来自香港大学的教授欣顿(W. J. Hinton, 1887-1949)发言

称,“本来在教育运动之后迟早会引起的政治运动发生得过早了”。他特别提到《中国之病》,指出这本“十分有趣”的书表明中国的问题在于中国人的“幼稚”,可他的中国学生则告诉他:“中国人觉得欧洲人是幼稚的。”^⑥1927年,英国政府以保卫公共租界的名义出兵上海时,曾将该书编入一本介绍中国的小册子中以供派遣军参考^⑦。

该书令甘露德成为20世纪二三十年代中国人面向西方书写中国时一个潜在的对话对象^⑧。目前,学术界对于甘露德其人及其《中国之病》一书的研究较为有限^⑨。本文拟在把握《中国之病》一书的主旨及内容的基础上,考察这本书出版之后在中外人士之间产生的反响,梳理甘露德的“死硬派”标签指涉的内容及其生成过程,以期揭示五卅运动以后西方人中国观的变动与分化以及民族主义高涨之际国人对“辱华”言论的态度及应对。

一、“直系拥趸”与“中国通”:作为外报记者的甘露德

甘露德1889年生于美国,1912年来华,最初代表一家西药公司贩卖西药,在此过程中学会了中文,1916年成为《字林西报》驻北京的记者,直至1929年

出任《纽约先驱论坛报》的评论员离开中国^⑩。1944年,甘露德回到中国,出任美国哥伦比亚大学新闻学院与国民党中央宣传部国际宣传处合办的重庆新闻学院的教务长之职^⑪。抗战胜利后不久,甘露德回到纽约^⑫。此后,他以笔名“Heptisax”继续发表文章,持“反苏”“反共”的立场^⑬。除《中国之病》外,1929年他还出版了一本名为《不平等条约:中国与外国人》(*The Unequal Treaties: China and the Foreigner*)的专著及一部名为《林蟒之莽》(*The Indiscretions of Lin Mang*)的小说。

在中外势力交织的民国报界,外国记者大多与某个中国政客或某个政治团体保持着较为密切的关系,这种在不平等的权力结构之下形成的跨国、跨语言的人际与信息网络构成了民国时期新闻界的一个重要特征^⑭。作为北洋时期一名相当活跃的外国在华记者,甘露德与直系军阀特别是吴佩孚关系深厚。一方面,直皖战争以后,与日本关系密切的皖系军阀倒台,为英美两国夺回因欧战而式微的在华影响力提供了时机。加之当时全国上下也对穷兵黩武的皖系军阀深恶痛绝,舆论几乎完全倒向直系,英美人主办的报刊亦对直系军阀和吴佩孚大加吹捧,宣称比起“一无是处的、腐败和不爱国”的安福系,直系是“崭新的、未经检验的,每个动作都势必向好,因为舆论正发挥着作用”^⑮。另一方面,吴佩孚十分注重笼络英美人士,英美两国在华的外交官、商人、新闻记者和传教士都是其努力结交的对象。他曾将《字林西报》的董事和编辑葛林(O. M. Green, 1876-?)及马立师(H. E. Morris)、《华北明星报》(*The North China Star*)的记者侯雅信(Josef Washington Hall, 笔名 Upton Close, 1894-1960)等人聘为顾问,甘露德亦在其列^⑯。白坚武是甘露德与直系军阀建立关系的关键人物。1919年4月,甘露德由美国人孙明甫(Roy S. Anderson, 1885-1925)引荐给白坚武^⑰。其时,白尚为江苏督军李纯的顾问。1920年前后白坚武转投吴佩孚,并成为直系负责内外交际的重要人物。直皖战争后不久,《字林西报》周刊《北华捷报》刊登了甘露德对吴佩孚的采访。文中写道:“吴佩孚将军看起来乐观自信,但也很机警,他显然有意以民主的捍卫者的身份巩固自己的军事地位。他手下的军官和人马

对于国内外事务的了解程度、对政治问题的熟悉和对将军事业的忠诚都是令人吃惊的。”^⑱吴佩孚成为直系的灵魂人物之后,甘露德与白坚武的交往更加频繁^⑲。

20世纪20年代,在许多美国在华人士眼中,吴佩孚所标举的民主、立宪的旗号与他们服膺的进步主义思想相一致,因而对其抱有很大的期望。但是,随着“好人政府”的倒台和曹锟贿选的发生,这种期望逐渐破灭,甘露德亦声称吴佩孚不再以建立代议制政府为目标,而是旨在排除异己^⑳。尽管如此,1924年10月冯玉祥发动北京政变,甘露德仍在报纸上为吴佩孚鸣不平,表示由于曹锟热衷于和张作霖争夺地盘,使得即使欣赏吴佩孚个人勇气和智慧的中外人士都不再支持他,但冯玉祥发动兵变后,人们的同情心又倒向吴这边。甘露德直指有日本人参与政变的谋划,但由于政变的目的未能完全实现,冯玉祥未能获得日本人事先承诺的资助。他刻意强调冯玉祥的基督徒身份,继而断言“中国的基督教事业蒙上一层乌云,因为它牵涉进一场自民国建立以来最不受欢迎的政治风波中”^㉑。

《字林西报》驻北京记者的身份及其与北洋政界的密切联系,使得甘露德的时政报道和评论得到英国政府驻华官员的关注。英国驻华公使朱尔典(Sir J. Jordan, 1852-1925)称甘露德是“真正能称得上紧跟中国时事的人”^㉒。1922年12月,英国政府正式表示愿意退还中英庚子赔款后,关于如何支配庚款的问题,英国政府内部及英商团体多有讨论^㉓。1923年3月24日,《北华捷报》发表了甘露德撰写的一篇题为《庚子赔款》的长论,文中对于负笈欧美的留学生回到中国后的表现多有批评,并指出美国越来越多的人不断表达出某种失望的情绪,认为“让中国人在美国接受教育是一项收效甚微的投资”。他认为,“即将接受现代教育的中国男孩们需要先在一个中国的环境中接受中国式的教育”^㉔。同年10月,曾任英国中国教育委员会(*Chinese Education Committee*)^㉕成员的R. P. 斯科特(R. P. Scott)博士致信英国外交部常务次官威尔斯利(Victor Wellesley, 1876-1954),将甘露德的这篇文章介绍给了后者。威尔斯利在阅读之后复信表示:“他对于留学生问题的分析最为有

趣,尤其它还来自一个美国人笔下,他认为,我们必须将我们的教育投注在中国本土,只将那些经过最精心挑选并受过成熟的教育的学生派到国外,这一结论让我印象深刻。”^②国民革命勃兴之际,甘露德的看法也在一定程度上得到英国外交官员的重视。英国派遣至中国处理敌产委员会(Clearing Office)的官员阿丁顿(Lord Addington)向外交部做例行报告时也曾引用甘露德对中国时局的分析。阿丁顿介绍道,有人认为中国民众的反帝情绪与列强同意召开关税会议有关,因为列强与民众痛恨的北京政府合作。他引用甘露德的看法指出:“列强给予他们鼓励和支持,努力与他们合作,此举正损害人民的利益,而列强又如此迫切希望得到人民的同情之理解。”^③英国外交部远东司官员格沃特金(Frank Asheton Gwatkin, 1889-1976)认为这些客观的报告反映了上海外侨对于中国事态的看法,特别提到其中介绍的甘露德的文章“格外有意思”^④。

不过,在一些对中国抱有同情的在华外国人眼中,拥护北洋军阀的甘露德是不受欢迎的。万县惨案发生后,甘露德对此事的报道令英国传教士霍德进(Henry Theodore Hodgkin)^⑤感到不满,他认为作为一名美国记者,甘露德对英国对华政策的解读是错误的。他写道:“我相信,贵报不少读者认为,甘露德先生所撰文章的调子,以及这些文章在英国人在中国所办的头号报纸中所占据的突出位置,对于中英两国的关系毫无帮助。”^⑥

二、“需加管束的孩童”:建立在种族优劣论基础上的中国观

较之发表在《字林西报》上的报道或评论,《中国之病》更能反映甘露德对中国问题的看法。该书正文部分共分为七章,在序言中,甘露德写道:“这本书试图表达的是中国和中国人的毛病,而不是中国做对了什么。”^⑦他声称,在排外风潮四起之时自己写作这本不讨巧的书,“正是因为当中国需要被‘打屁股’的时候,却不断受到过分的褒扬和过高的评价,她已经成为了被宠坏的任性的孩子”^⑧。这无疑是一个冠冕堂皇的理由,在写给其出版商的信件中,他明确表示撰写此书的用意在于影响英国国内的公众,使他们支持对华采取“大规模的显著的极端举措”^⑨。

甘露德的论点是建立在种族优劣论基础之上的。在他看来,中国人是“不能自我管理而必须由他人主宰”的劣等民族,他们一旦被赋予优等民族享有的自由权,便可能给整个世界带来麻烦,因而需要优等民族的“监护”^⑩。事实上,甘露德的这套种族优劣论的背后是地理大发现以来,随着欧洲资本主义国家殖民扩张而建立起来的一套文明等级论,其实质是欧洲中心主义,意在为欧洲国家对其他国家的殖民和侵略提供借口。他将中国人比作“被宠坏的任性的孩子”,这在西方人对东方民族的叙事中并不罕见。曾任英国驻埃及代表和特命全权总领事的克罗默勋爵(Lord Cromer, 1841-1917)对印度人、埃及人、希卢克人(Shiluks)或祖鲁人(Zulus)的统治术的总结是“首要的问题是考虑什么是这些从整个民族来说还或多或少处于未成年状态的人自己认为最好、最符合他们利益的东西”^⑪。

为了使自己的观点更有说服力,在第一章“假象”中,甘露德将既往书写中国的传教士、记者、商人作为批评对象。他把这些人称为理想主义者、理论家、“感性主义者”(sentimentalist),“他们笃信人人生而自由平等,人人享有不可剥夺的生存、自由和追求幸福的权利,能力和道德只取决于教育、贸易和环境。他们相信民族自决,并且拒绝承认有人天生不适合决定自己的事务”^⑫。自认与中国的各个阶层有深入交往的甘露德表示,对中国了解得越多,越是对那种“盲目的同情感到不安,这种中国给西方造成的误解尤其来自盎格鲁-撒克逊人中的理想主义者”^⑬。

在他看来,既往西方人关于中国的认知大都浮于表面,受到这些观点的误导,西方人对中国生出不必要的同情和宽容,而那种认为只要列强优容和善待中国,中国人便会回报他们的想法,更是一厢情愿。因为,在中国人心目中,仁慈和慷慨意味着软弱或贿赂^⑭。英国效法美国归还庚子赔款之后,“中国不仅没有感恩,还自认为包括她最强大最傲慢的敌人在内,全世界都对恢复生机后的实力感到恐惧,都在讨好她”,因此中国没有理由“不踢全世界的脸”^⑮。他还注意到欧战以后中国文化界出现的西方衰败论,认为中国人将“西方列强在中国所做的所有恩惠之举,看作西方不断衰落的又一个象征”^⑯。

在第二章“社会传统”中,甘露德围绕儒家制度和父权制,介绍了中国的社会结构。他批评中国人在家庭内部敦亲睦族,面对家庭之外的人则自私自利。“大体上,在家庭中的中国人十分慷慨、最能够自我牺牲。在家庭之外,他们是地球上所有种族中最少顾及他人舒适与幸福的。”^⑧他认为,这种“内外有别”的传统也延伸到国家政治层面,中国的统治者们也非常善于将对内的矛盾转化为对外来者的敌视。他从义和团运动的经验出发断言:“在中国,没有得到父权主义首肯的内在革新从来都不是爱国主义,除非革新的发起者是大家长本人,但这也仅是在家族遭到外部攻击的情况下才成立。”^⑨在甘露德看来,辛亥革命之后,父权制崩解,中国便成为一所“没有纪律的学校”。由于“儒家制度阻碍了中国人发展出在西方的幼儿园孩童之上的人格”,这所学校的自控与自治也无从谈起^⑩。

不仅是社会传统,甘露德还从语言文化的角度论证中国人的幼稚。在第三章“语言与文学”中,与许多汉学家都赞扬中国语言的复杂精深不同,甘露德则认为中国语言和文学是幼稚浅薄的,进而断言:“一个文学及其表达方式都处于婴儿期的国家不可能在全世界面前占据领导地位。”^⑪他的依据是,汉语“缺乏语法和句法(syntax),作为补充的是大量的习语”,“大部分汉语对话都不是由富有逻辑的紧密联结的词组和句子构成的,而是由一些模式化的口头表达程式组成,它们都是翻译时没有意义的惯用语,句子是如此松散,以致听众需要自己加上连词和其它连接成分”。这种“不准确的缺乏逻辑的语言导致大众思考的不精确和无逻辑”^⑫。甘露德的看法其实并不新鲜,早在1826年,普通语言学奠基人威廉·冯·洪堡特(Wilhelm von Humboldt)就曾提出,与其他语言必须利用言语的内在联系为语法服务不同,汉语中“表达有意义的独立概念的词”是孤立存在的,“汉语让听者自己去添补一系列中介概念”,在日常通俗的运用中,承担这一任务的是大量意义固定不变的惯用语^⑬。就语法的完善程度而言,洪堡特将汉语和梵语视为两极,分别代表着“拒绝对语法范畴做精细、细腻的区别”的语言和“始终如一地追求这种区分,直至最细微的方面”的语言。他认为,汉语的优

点在于简单清晰地把概念一个个排列开来,但这也使得“汉语作为思维工具无疑远远比不上拥有完善的语言形式的语言”。他还提到,“语言形式的缺乏令人想起儿童的语言”^⑭。甘露德利用语言发展史中对汉语的认知阐发所谓“中国人是幼稚的孩童”的观点,这种挪用无疑是简单粗暴、缺乏逻辑的。

在第四章“历史”中,甘露德又将矛头指向被西方观察家们称道的中国的悠久历史,批评“大多数著名的汉学家都中了学究式的魔咒,他们用欧洲的语言文字构成了某种宣传,引导着全世界对中国感兴趣的人借由中国人眼中的过去判断现代国家的好坏”^⑮。他认为,中国文明是强权统治的产物,中国人被规训得充满奴性。“在中国历史上从来没有得到被统治者同意的政府。中国人从来没有直接或间接地选择过统治者,历朝历代在混战中能够最娴熟、阴险地运用暴力或权谋或二者兼有之的手段进行统治的人胜出,而土地和生活在这片土地上的人民就是他的战利品。”^⑯他认为,“在如此容易引发愚昧的狂热的情况下,中国人相对的驯服,未受过自治训练的民众的被动与冷漠,是让西方对她的未来感到希望渺茫的特性指征”^⑰。甘露德对中国历史的看法无疑是片面的,诸如文景之治、开元盛世等政治清明、社会发展的历史阶段完全被他排除在视野之外。

在第五章“男子气概的标准(Standards of Manhood)”中,甘露德则从中国人在体质与精神特征的角度评判中国人。他提出,中国人和盎格鲁—撒克逊人对于运动的不同态度反映了两个民族对男子气概(manhood)不同的认知。“一万个中国人里没有一个像一般的西方人那样,喜欢高强度的运动、粗野的游戏和冒险。”^⑱在近代西方民族国家的发展历程中,男性公民具有男子气概被视为民族振兴、国家富强的必要条件。卢梭就曾将法国男性的女性化、缺乏男子气概作为法兰西民族亟须解决的问题,法国大革命时期恢复法兰克人的强壮则成为唤醒民族精神的重要话语^⑲。然而,甘露德的判断并非来自自己对中国男子的观察,而是出于西方人的优越感。在他看来:“只要白种人保持着必定被中国人视为野蛮的男子气、活力、创造天性、进取性和冒险精神,物质世界的实质决定了身心缺乏这种男子气的民族必然居于次

要地位。”^⑤

在第六章“对外关系”中,甘露德又为列强对中国的侵略张目。他毫不掩饰地指出,西方借助武力迫使中国签订不平等条约,仅仅是为了获得在华居住、贸易的权利。他还大言不惭地表示,按照东方国与国的关系,当一国“进军攻陷另一个国家的首都,迫使皇帝逃亡他处”,战胜国就应该“统治并剥削那个国家”^⑥。因此,西方国家在武力占优势的情况下,仍然允许中国就条约的具体条款和自己讨价还价进而建立正式的条约关系是极为愚蠢的。他力主列强应该对中国采取强硬的态度,理由是自己深谙中国人对付外国人的办法。他颇有把握地写道:“中国有且仅有两条外交路线,要么利用外国人的单纯,他们无论如何也不会得到中国人的感激;要么是让他们自己互生嫌隙。”^⑦在甘氏创作的英文小说《林麟之莽》中,主人公林麟也大谈这种地方官员的“驭外之道”:一方面“明令禁止任何对于外国人及其财产的攻击”,另一方面默许民众“亵渎信仰、流露敌意、不时滋扰、间接羞辱”,一旦事态激化,中国人可以利用西方人的“宽宏大量”规避惩罚^⑧。且不论晚清以来中国外交制度逐步与世界接轨的努力以及对于国际法的学习和接受,仅就将华洋冲突简单地归咎于地方官员的煽动这一点而言,甘露德也是相当偏颇的。

在最后一章“混乱与外国影响”中,甘露德由历史转向现实,将矛头直指五四运动以来中国高涨的民族主义情绪。他向读者发出警告:“各个阶层的中国人现在都在这样一种兴致高昂而挑衅的排外情绪中,以至于在炮舰和登陆军队不及的地方,没有任何在华的外国人和外国产业能称得上绝对安全。”^⑨在他看来,刺激中国民族主义的兴起有两个因素:一是“西方列强的软弱消极政策一开始便给布尔什维克提供了绝佳的可乘之机”^⑩;二是欧战结束后中国凭借“通过名义上的支持而不是名副其实的出力获得的作为同盟国的国际地位”,得到了没收德、奥侨民财产,收回德、奥租界等“红利”,并在此基础上逐步推进“侵蚀条约的政策”^⑪。在这里,甘露德无视中国曾派出十余万劳工奔赴欧洲战场,将中国说成“不劳而获”的得利者,是完全不符合事实的。

甘露德在《中国之病》中表达的观点,可以概括

为“中国人是小孩,他们的世界是小孩子的过家家”;因而“他们没有管理自己或左右自己教育进程的权利,就好像学校的小学生不能使唤老师,也不能决定学什么不学什么一样”^⑫。通观全书,不难发现,其逻辑是先从社会结构、历史文化和精神气质等方面,证明作为一个族群实体(racial entity),中国人没有满足现代社会的要求,再呼吁列强对华采取强硬政策。甘露德在写作《中国之病》时几乎从未摘下“有色眼镜”,为了煽动西方公众对中国的反感,他甚至不惜刻意隐瞒或歪曲事实。例如,甘露德将欧战后克林德牌坊的拆除视为外国在华权威衰落的开端^⑬,显然有意忽略它被庆祝协约国胜利的民众移往中山公园,并更名为“公理战胜碑”的事实。又如,在谈到1924年英国交还威海卫租借地谈判时,他不顾中英谈判系因在刘公岛租期问题上的分歧而中断的事实,诬蔑北京政府向英国勒索“借款”,并说英国“为了归还中国领土需要付钱给北京(政府)”^⑭。不过,身为《字林西报》驻北京记者,甘露德对于民国初年中国政情的某些记述依然值得我们注意。例如,在最后一章中,他提出1920年年初远东共和国的达尔塔通讯社(Delta News Service)在北京开展业务是苏俄和共产国际在官方层面进入中国、传播革命的开始。他指出该社名义上是远东共和国的通讯社,实际上也负责收发罗斯塔通讯社(Rosta News Agency)^⑮的新闻,具有“半外交”职能,其核心人物霍多罗夫(Hodoroff)通过这个貌似慷慨的新闻机构多方活动,使得苏俄“鼓动者们”在上海、广东和其他主要城市站稳了脚跟^⑯。

三、吸引“眼球”与引发担忧:上海英文报纸与华侨的反应

在《中国之病》的序言中,甘露德不无得意地写到,五卅运动前后他的友人对此书的评价发生了极大的变化:1925年1月至5月之间,读过该书书稿的友人善意地提醒他注意“关于中国人的性格和生活方式的某些评论中那没有必要的苛刻口吻”,而五卅运动爆发后,“这些批评家中的大部分人自此之后都声嘶力竭地喊出了远比本书的各章节还要激烈的批评”,甚至把他称颂为“先知”^⑰。的确,五卅运动的爆发令世界感到震惊,而这本宣称要告诉世界“中国之

病”的著作无疑是引人注意的。该书出版后在纽约、芝加哥、温哥华等地销路颇佳,出版社决定加印800本,其受关注程度由此可见一斑^⑥。然而,外国读者对它的评价却并不完全如甘露德所言。

该书很快遭到在华传教士的批评。甘露德在书中所概括的所谓中国人“爱面子”“小气”“缺乏运动精神”等特点,让人不由联想到美国传教士明恩溥(Arthur H. Smith, 1845-1932)的《中国人的气质》。19世纪最后二十年在山东传教的明恩溥,基于其切身的中国乡村经验与观察以及美国福音主义思想的影响,坚信中国应该并且能够实现改良,这种改良是精神的和内在的,而不是技术的和外在于的。信仰基督教便是提振中国人精神、提升中国人素质的良方^⑦。在《中国人的气质》中,他总结道:“支那者,不可不由基督教文明以完全之,且永久以改革之。”^⑧与明恩溥不同,甘露德则直接将中国打上“劣等民族”的标签,并声称中国必须受到比其优越的民族的管束。在《中国之病》第五章的末尾,甘露德自认已经阐明了中国与西方之间孰优孰劣,谁有资格统治对方。他总结道:“东西方之间的这些根本性差异只能通过长时间的进化才能根除,而不是通过召开会谈、传递好感、普及教育或是灌输某种宗教能达成的。”^⑨此外,甘露德在书中直接向来华传教士所塑造的中国叙事发起挑战,直指那些在中国有着数十年生活经历的传教士被自己的母国视为权威,而事实是“只要谈到基于对中国问题的错误认知而形成的对华政策的误区时,不可避免地要涉及传教士在东西方的影响”^⑩。

最先在中国的公开出版物中提到《中国之病》的是内地会传教士窦乐安(John Darroch)^⑪。他于1926年5月22日在《北华捷报》“书评”栏目中对该书做了介绍与评论。他认为,甘露德在这本书中挑战了既有的西方人视野下的中国形象,指出:“他像一个行为乖张的骑士,异想天开地想要让世界看到真实的中国,证明她不是传教士、旅行者和外交官们所歪曲的那个中国。”他承认甘露德对传教士笔下的中国叙事的抨击有一定的道理,但认为“在那些传教士、商人和外交官们具有共识的某个观点上,在个人追求的自私之外,也许有某种真实性”。他也不赞同甘露德所主张的租界和外国人居留地的繁荣完全得益于

外国人的观点,认为“中国的商业人口和它广阔的腹地加上外国的控制才造就了今天的上海,如果没有前两个因素,上海只是一片泥滩”。对于甘露德在书中鼓吹列强干涉中国内政的论调,窦乐安提出异议。他认为:“中国最近的历史确实让那些对她寄予期待的人感到相当失望,但这些问题并不意味着外国列强有权‘瓜分’她。”他主张:“必须允许中国找到自己的拯救之道,即便她在这个过程中要承受苦难的命运,直到这条漫长的道路发生转折。”他强调中国作为一个独立国家应当享有主权,“中国的长城已经坍塌,她不可能自外于席卷全世界的革命思想的浪潮中。列强们不再能如愿地将中国人当作小孩来看待。无论怎样,中国人才是他们自己国家的主人”。尽管窦乐安在上述问题上与甘露德的看法不同,但在中国民族主义思潮的问题上,二人却不乏共鸣。在窦乐安看来,中国民族主义情绪的高涨是受到了“某些外国老师的恶劣影响”。他注意到“在过去的五年中,类似苏俄特工传入中国的煽动性宣传造成的国家威望的损失,其影响之甚是莫斯科即使用半个世纪的时间也无法在任何西方国家做到的”。对于甘氏所说的强力的政府才能使中国屈服,仁慈软弱的统治则容易生变,窦乐安也表示认同。他从自己的经验出发写道:“受到合理控制的中国仆人们是讨人喜欢的,如果我们放手,他们便会把家园变为鬼域,但是那是主人的责任而不是仆人的。”窦乐安担忧,甘露德这部著作势必引发中国读者的不满与批评。他预言道:“他扔了很多石头,也必然知晓这些石头必将被捡起来并重新投向他。尽管这本书中包含的中国的真相比过去十年相关主题的任何一本书都要多。我们认为,它本可以不用如此激烈的方式表达出来,对于那些可以从糟糠里筛出粮食的读者来说,这是一本好书。”^⑫我们不难感受到在中国民族主义情绪高涨的背景下,窦乐安的某种矛盾心理:一方面甘露德说出了他想说而不敢说的话,另一方面又惧怕该书引起中国人的反感。

在窦乐安的书评发表后不久,其他上海的主要报纸也注意到《中国之病》一书。相比《北华捷报》这份代表在华英侨利益的报纸,由美国人在上海所办的报纸对于这本书的观感则要负面得多。《大陆报》

称这本书在英国引起了许多关注,并援引伦敦《泰晤士报》的报道称该书通篇只有“具有毁灭性的批评,没有建设性的思想作为缓冲”^③。1926年5月29日,《密勒氏评论报》也刊文对《中国之病》做了介绍。这篇文章以《甘露德先生写了一本书!》为题,并直言许多中国人会讨厌这本书,因为“甘露德先生证明,至少他自认为证明了,中国人无法治理自己,而唯一的补救办法便是外国的干预”。这篇文章介绍了该书第一章对罗素等人的批评,接着转述宴乐安在《北华捷报》上的那篇书评。文中还注意到甘露德对中国文化的全盘否定。作者写道:“实实在在地说,甘露德先生将中国批评得体无完肤。他说中国的诗歌是多愁善感的月光,没有丝毫高尚可言;中国的经典哲学古板而乏味,处处透露着幼稚的对于(哲学)基本原理的无知;中国历史是信口开河、胡编乱造,而且常常带有偏见,而经典中的儒家道德则要么是幼稚的陈词滥调,要么便是基于传统成见的武断的规则……”^④

在中国生活多年的外侨中也有人认为《中国之病》表示反感。曾任上海海关税务司的赖发洛(Leonard Arthur Lyall)^⑤认为甘露德严重伤害了中国人的感情,并希望“数年后甘露德先生的书绝版并被遗忘”。1926年11月,他在一个演讲中说道:“另一个令他们与中国和中国人民的关系产生无法估量的损害的便是英国的报纸,其中反映的思想与甘露德是书的风格颇为相近。”^⑥赖发洛所指的是五卅运动以后在华英商和侨民群体在英文报刊和著作中鼓吹的一系列被概括为“上海心理”(Shanghai Mind)的观点,概括而言,即认为中国尚不具备成为一个文明政府的条件,无法保障他们在中国的生命和财产安全以及贸易的权利为由,要求保留治外法权、租界行政管辖权及海关控制权等所谓“必需特权”(essential privilege)^⑦。可以说,甘露德在《中国之病》一书中的种种错谬论述,恰恰为“上海心理”的发酵提供了催化剂。

四、“被打耳光”之后:罗运炎电请驱逐甘露德引发的攻讦

如果说,最先注意到《中国之病》一书的是在华外侨群体,那么该书为中国人广泛知晓则始于基督教知识分子罗运炎^⑧撰文批驳该书并倡言驱逐甘氏。1926年6月2日,《申报》刊登了一则新闻,其中

转载大华通信社的消息称,罗运炎于前一日致信颜惠庆,称甘露德的《中国之病》一书“公然主张外力干涉中国,列举种种理由,尤以我民族缺乏自治能力为其立论之要点,且杜撰历史事实,以为佐证”,罗氏认为甘露德“有意侮辱我国政府,诬蔑我民族”,因而主张北京政府应当立即向英国驻华公使提出抗议,将甘露德驱逐出境,并没收其著作,“以示薄惩,而正言论”。他还进一步指出,在华外人时常有侮辱中国尊严的言论,如果政府不予以取缔,“不啻自暴其弱,默认一切,足以混乱世人视听”^⑨。目前笔者尚未找到材料证实,罗运炎是否确实曾上书颜惠庆要求驱逐甘露德,也无从知晓如果罗氏确有此举,颜惠庆作何反应。不过,其时颜惠庆刚刚重新上台组阁,因张作霖的反对,阁员纷纷避走,这个几乎由颜惠庆一人独撑的内阁仅成立月余即宣告解散^⑩。在此多事之秋,颜惠庆即便收到罗运炎的来信,也很可能无暇顾及^⑪。

罗运炎上书颜惠庆、要求驱逐甘露德的新闻,立即引起《字林西报》的注意。6月3日,《字林西报》在头版刊登消息称,“中国宣传家要求将甘露德先生驱逐出境”。这则报道先介绍了罗运炎的身份,“据信是一位美以美会牧师及一个地方美以美教会发行的中国基督教刊物的编辑”。《字林西报》先转述了《申报》的消息,接着澄清称,甘露德并非罗运炎所认为的英国人,而“恰巧是一个美国人”^⑫。罗运炎看到《字林西报》的这则更正之后,立即致信该报予以回应。他首先对《字林西报》指出自己的错误表示感谢,并希望刊载此消息的中文报纸做出相应的更正。接着,他解释自己致信颜惠庆的目的是“去除相互理解和国际友谊的障碍”,并表明自己并不认识甘露德,只是认为他的著作是“我国同胞和其他国家国民友好亲善的阻碍”^⑬。罗运炎倡言驱逐甘露德一事在来华西人群体中引发不小的关注,在此后的一个月中,《字林西报》的“记录与论说”(Notes and Comment)栏目,以“罗博士与甘露德先生”为题,刊载了一系列相关文章。

6月5日,《字林西报》在一篇社论中批评中国驻国联代表朱兆莘,指责他“以有辱中国为由要求国联遏制别人所了解的真相”,附带提及了罗运炎,暗示

他们都存在为本国“护短”的倾向^⑧。有读者也撰文为甘露德鸣不平,认为罗运炎忽略了甘露德在该书序言部分所做的解释,称:“甘露德先生明白地说,他只关心中国的问题。如果他要着笔讨论她的民族性格中的优点,他需要再写一本至少同样篇幅的书。”文章的作者直言,罗运炎致信颜惠庆之举恰恰是“中国之病的鲜明例证”^⑨。一位署名“鲁弗斯”(Rufus)的读者也为甘露德辩护,他指出罗运炎并未读甘露德原书,因为甘露德在书中至少三次说明了自己的美国人身份,从而质疑罗运炎品评此书的资格。他还从另一个角度看待此事,颇为自信地说:“他的抗议只会激发人们对这本书更大的兴趣,而且可以非常肯定地说不会导致作者被驱逐出境。”^⑩6月7日,罗运炎再次在《字林西报》上发表文章,重申自己的主张。他表明,自己反对甘露德其人其书:一是因为“他公开主张列强干涉中国”,这是对中国政府和人民的侮辱;二是甘露德书中所说皆是“不实之词”,而非像《字林西报》所说的,问题仅仅是“他的一些批评中也许有夸大之词”。他还回应鲁弗斯道:“我确信,如果允许行销,这本书将会有可观的发行量,并取得丰厚的利润,但是它是以外中友好亲睦为代价的。”^⑪《字林西报》的编辑在这封信后附言,再次为甘露德辩护,认为甘氏只是希望像中国真正的朋友一样,“揭开虚伪的伪装,为真正的改革做实实在在的准备”^⑫。

在上海英侨中地位举足轻重的英商李德立(E. S. Little)^⑬也致信《字林西报》,对此事发表意见。他认为罗运炎要将甘露德驱逐出中国一事,是他印象中“最为有违常理的要求”。他指出,“许多美国人恶意地批评英国,但我从没见过英国人如此心胸狭隘,要将他们中的任何一个从英国驱逐出境”。他建议罗运炎写一篇详细的书评,明确指出这本书歪曲事实之处^⑭。

很快,罗运炎便撰写了长文回应李德立的要求。他直白地写出了自己阅读这本书的感受:“我们中国人被扇了耳光、挨了痛揍和恶意毁谤”。他列举了甘露德书中令人不快的观点:其一,抨击来华西方人对中国的描述;其二,批评留美学生;其三,将中国人比作孩子;其四,他再次强调这本著作将会带来的

负面影响:一方面它有可能引起中国人的排外情绪,另一方面又会让西方对中国产生更多的误解^⑮。

这篇文章发表后,李德立又做出了回应。他认为,甘露德不但让中国人感到“被打耳光、挨了痛揍和恶意毁谤”,外国商人、外交官、记者和传教士也是如此,但是这些人中并没有人要对他赶尽杀绝。他强调,“每个人都有言论自由”,而罗运炎的行为恰恰表明中国人民不懂得真正的自由。李德立表示罗氏的抗议反而促成了《中国之病》的热销:“邮轮上,一群外国旅客讨论着罗先生的信,他们中没人读过这本书,但是每个人都打算一到上海便买一本”。他还鼓励罗运炎仿效甘露德,写作一篇文章来历数他眼中西方的问题,并戏谑地说道:“我代表外国人表示,我们不会要了罗先生的命的。”^⑯针对李德立提出的建议,罗运炎则表示自己作为一个中国基督徒,并不推崇“以牙还牙,以眼还眼”式的复仇^⑰。

在非基督教运动和五卅运动的影响下,中国基督教知识分子的民族身份认同越来越强烈,他们将自己视为“信耶稣的国民”,一方面积极推进建立本色教会的活动,另一方面也活跃于世俗社会的政治活动中^⑱。从其人生轨迹和著述来看,罗运炎当属这类基督教知识分子中的一员,其对《中国之病》和甘露德的抵制反映了其鲜明的民族主义立场。然而,罗运炎的激烈反应立即引发部分在华外侨的不满,他们以《字林西报》为阵地,抨击罗氏违反言论自由原则、无视中国现实问题,甚至将此事作为指摘中国的又一例证。

五、“唱反调”:雷穆森与夏晋麟对《中国之病》的回应

除了中外人士撰文评论《中国之病》,并围绕“驱逐甘露德”的争议展开论战外,甘露德《中国之病》的出版还催生了与其立论相反的著作。澳大利亚人雷穆森(Otto Durham Rasmussen, 1888–1970)撰写的《中国国是实况》(此为该书封面题写的中文书名)一书即是一例。该书英文名是“*What's Right with China*”,副标题为“对于外国批评的回答”(An Answer to Foreign Criticism),从这个标题中便能看出该书以甘露德《中国之病》作为潜在的批评对象。雷穆森1906年前后来中国,先后在多家天津的外国报纸任职。他更

为人熟知的成就是对于天津租界历史的书写。他曾编写出版过《天津插图本史纲》(*Tientsin: An Illustrated Outline History*)和《天津的成长》(*The Growth of Tientsin*)两部著作,今天仍是研究近代天津历史的重要资料。

《中国国是实况》1927年由商务印书馆出版。在序言中,雷穆森花费了较大的篇幅介绍自己的家族历史,并称“如果在这些先天影响或后天记忆作用之下,作者尊重自由与和平的原则,他只是做着和他的先祖们一样的事,他代表着他的条顿祖先们,就像金色头发的条顿祖先对海盗特权的民主抵抗所坚持的”^⑤。他写道:“随着敏锐的世界舆论中充斥着的反华宣传快要达到饱和状态,作者在写这本书时起初想将其命名为《中国批评家们错在哪里》(*What's Wrong with China's Critics*)”^⑥。紧接着,他直接引用了甘露德的著作,以之为论敌的意图显而易见。就具体内容而言,雷穆森可谓处处与甘露德针锋相对。例如,甘露德批评中国人缺乏运动精神,雷穆森便反驳自己曾经在多项运动竞技项目中与中国人一较高下,并且对他们显示出的“高超的运动员风范、追求优胜的精神以及对于比赛真谛的恰当理解”^⑦印象深刻。又如,甘露德坚决反对中国人提出的收回租界、租借地的要求,理由是这些“被中国人认为没有任何用处的地方:泥滩、沼泽、贫瘠多石的半山腰,无法靠近的下锚处,而现在这些地方都是地价最高的地方,中国的民族主义者们正拼命地想要收回这些地方,再为了中国宝贵的‘面子’把它们重新打回中国人的不值一文的不毛之地”^⑧。雷穆森指出这些地方所处的条约口岸的兴起是三个因素综合作用的结果,即“地理位置、海外贸易的迅速发展以及它们作为中国的政治难民的避难所的地位”^⑨。面对国民革命的浪潮,与甘露德鼓吹干涉不同,雷穆森表露出明显的同情态度,这从该书扉页的献词中便可以看出。他写道:“谨以此书献给中国年轻的男人和女人们,他们高擎的理想是将祖国从外人控制的一潭死水似的落后状态中拯救出来,带上通往进步的坚实大道。”^⑩

雷穆森对甘露德的驳斥招致另一位被视为“死硬派”的代表人物——《京津泰晤士报》主笔伍德海的不满。《中国国是实况》面世后,伍德海在《京津泰

晤士报》上发表了一篇书评,题为《一种“上海心理”及其矛盾之处》(“A ‘Shanghai Mind’ and Its Contradictions”),此文后被《北华捷报》转载。文中罗列雷穆森在1926年发表的对中国的民族主义、反基督教运动、废除不平等条约的诉求等问题的言论,将它们与《中国国是实况》一书中的观点一一对照,并且指出“几乎在每一个问题上,他现在所写的都与不到一年前表达的观点截然相反”^⑪。伍德海认为,在过去的11个月中中国并没有发生足以促成雷氏态度骤变的大事,因此怀疑雷氏之言并非真正发自内心。

雷穆森对此做出了正面回应,指出过去的一年大事不断——北伐军兴、英国发表旨在调整对华政策的备忘录、陈友仁—欧玛利发表联合声明及中国收回汉口英租界、共产党人的起落、英国出兵上海等。他指出,“世界各国重新检视外国在华地位问题,西方认识到它应付中国人的笨拙办法可能是站不住脚的”,与之形成鲜明对比的则是“洋人宣传家们所谓中国一无是处的荒谬叫器,以及日益暴露的不负责任的英国宣传家的放肆咒骂”^⑫。然而,即便在中国人眼中,雷穆森对甘露德的反驳也缺乏一定的说服力。温源宁认为雷氏此书虽然通篇在与甘露德唱反调,却并无太大的价值。在他看来,诬蔑中国的甘露德好比“总是围着中国这块肥肉嗡嗡飞的苍蝇”,不值一提,而雷穆森对甘露德的批评也流于形式^⑬。

此外,1926年7、8月间,正当甘露德的《中国之病》成为《字林西报》《密勒氏评论报》等报纸中颇受争议的问题时,曾留学英国的知识分子夏晋麟^⑭以同样的题目在《字林西报》上连续发表五篇文章,试图从中国人的角度回答“中国究竟怎么了?”夏晋麟历数从洋务运动到辛亥革命中国所面临的危机以及中国人应对危机的努力,承认民国肇造后中国的历史是“不光彩的”。痛定思痛,夏晋麟试图找到中国真正的乱源。首先,排外运动。他分析中国人的排外情绪主要出于三个方面的原因:一、不断加剧的不公平感,西方各国对中国所做的坏事,有的是实际存在的,也有的是子虚乌有的;二、某种程度上是对在华外侨在中国人面前表现出的优越感和有意地歧视政策的反动;三、那种认为外国人对中国所有的问题和苦难负有责任的观点。夏晋麟反对盲目排外的思

想,认为“东西方的相遇是世界发展的必要结果,而不是一场意外,双方注定要建立永久的联系”^⑧。但是,他也指出排外运动的背后是中国民族意识的觉醒。夏晋麟意识到了民族主义是一把双刃剑:一方面,民族自觉意识的产生和民族精神的发展与凝聚是有益于中国的,并提醒人们民族主义思想正是由西方传入中国的;另一方面,受到某些极端思想的影响,中国人的民族主义意识存在着盲目排外和盲目反对基督教的倾向。在他看来,民族主义本身无法为中国的问题提供任何实际的解决方案。其次,个人主义。夏晋麟认为中国的危机在于旧道德废除之后直接导致的个人主义盛行,这便是甘露德在《中国之病》中所谓中国人没有自我治理能力的问题。他认为,传统中国约束个人行为的乃是辜鸿铭所说的“君子之道”(“Law of Gentleman”),而它被大部分留学西方的知识分子谴责与抛弃,这直接导致中国个人道德的堕落。在社会生活中,个人主义又造成人们缺乏合作精神和纪律,政客与军阀中间的龃龉和混战也归因于此^⑨。最后,自上而下的贫困。中国的诸多弊端都来自于国家和个人的贫困。他历数晚清以来不断增加的赔款数额,并指出这些债务给民国政府带来沉重负担,“新政府不得不面对迄今为止的所有债务,还要为组织全新的政府提供资金”,以致政府财政支绌。在这种情形下,新近发生的军阀截流盐税的行为固然是错误而不值得鼓励的,但也实属无奈^⑩。夏晋麟批评有的作家把中国描绘得一无是处,“他们似乎在中国的每个角落都看到腐败;他们沉迷于那种中国人从根本上便有错处的想法”。他们忘记了中国人民普遍饱受贫困之苦,而贫困的根源在于“贸易发展的不均衡、人口的快速增长和社会经济的根本变化”^⑪。将这些观点和文章的题目结合起来看,不难发现,他的批评对象正是甘露德。他认为,中国正在经历着由农业立国向工商业立国、由地方性经济向全国性经济的转型,而在这个过程中外国的力量可以在很大程度上帮助中国。在阐述了自己对“中国之弊病”的看法之后,夏晋麟提出中国需要完成革命与再生两方面的任务。他写道:“我所指的革命乃是在其原始的意义上,改用一套全新的制度,逐步形成一种新的秩序;我所指的再生则是指

精神和内在生活的改变与更新。”^⑫要实现这种革新,首先需要解决人才问题。他主张重用学成归国的留学生,任人唯贤,使他们能够发挥各自专长。

相较于罗运炎激进地要求驱逐甘露德以及雷穆森虽然全面但缺乏说服力的回击,夏晋麟的这一系列文章显得更有深度和富有建设性。夏氏并非简单地指责甘露德书中的错谬之处,而是在承认中国有痼疾的基础之上,从中国人的立场出发分析这些痼疾的根源,并且提出改进办法。正如《字林西报》的中国读者和积极投稿者邵芾棠指出的,比起甘氏书中的不实之词,真正令中国蒙羞的,是“压迫我们的政府、贪腐的官员、自私而卑躬屈膝的国民”^⑬。夏晋麟的文章在一定程度上便是抛开激烈的情感因素之后的理性反思。

六、“死硬派”称谓的实质

在近代以来西方人关于中国的书写中,像明恩溥和甘露德这类从所谓国民性入手书写中国的例子并不鲜见。费正清曾指出,明恩溥对中国人心理的分析在美国和日本受到关注,在他看来,甘露德的这本著作更是将西方人对中国人品格的蔑视表达得淋漓尽致。他还指出美国政治学家白鲁恂(Lucian Pye, 1921-2008)的著作《中国政治生活的精神:从心理文化方面研究政治发展中的权威危机》(*The Spirit of Chinese Politics: A Psychocultural Study of the Authority Crisis in Political Development*)实际上继承了明恩溥的“衣钵”,只是披上了社会科学的外衣^⑭。若将《中国之病》和白鲁恂的《中国政治生活的精神》二书对比,便会发现,后者在其研究中将对中国父权制家庭的分析延伸到中国政治文化中权威丧失的阐发,很容易使人联想到甘露德将中国人视作需要管教的孩童、将混乱的中国比作丧失权威的学校。白鲁恂认为,剧烈的社会变动以及战争与革命破坏了中国的家庭组织,而“中国父母们的混乱正是中国文明在现代所遭遇的混乱的一个生动的、显微镜式的反映”^⑮。

不过,在这套看似一脉相承的话语之外,将甘露德的《中国之病》放回到20世纪20年代中期的特定历史语境中,探究这本书面世后引发的反响,不难看出,真正引起中外读者反感与批评的,不仅仅是甘露德对所谓中国人民族性的评头论足,而是他对于当

时中国各界“废除不平等条约”的呼声和高涨的民族主义运动的敌对态度。该书出版前后正是北京政府借助五卅运动激起的民气推动修改不平等条约,敦促列强召开延宕已久的关税会议和法权会议之际,因此甘露德在书中对中国的批评与指摘显得尤其刺耳与不合时宜。甘露德的观点与当时部分以“中国通”自居的外国记者声气相通。在甘露德看来,正是英美对中国的民族主义者态度软弱,才使得苏联得以乘虚而入,将“帝国主义”“不平等条约”等概念输入中国。他将五卅运动和省港大罢工视为在苏俄支持下中国已经“布尔什维克化”(bolshevized)的表现^⑧。这种看法在当时的西方人中并不少见,辛博森(笔名Putnam Weale)^⑨在其著作《中国为什么看中了赤色》一书中将苏联和日本视为两个影响英美在华利益的因素,并将中国反对不平等条约的要求视为苏联宣传的结果^⑩。前文所提到的李德立也曾露骨地写道:“不幸的是,中国的民族主义则是现代社会最令人骇异的丑闻:它既野蛮又不文明。这种中国人的心理状态表明,中国还没有完全适应现代标准意义上的生活和行为方式。民族主义是一种非常畸形的布尔什维克主义,正派的中国人和外国人都很反感它。如果中国人自己不能处理好它,即便以外国干涉为代价也应该消灭它。”^⑪与甘露德将辛亥革命后十余年间的政治进程称为“滑稽剧”一样,伍德海在《中华民国之真相》中也写道:“自1912年满人退位后,她从未成为一个真正的共和国,只是徒有其名而已。”^⑫和甘露德一样,他也对同情中国的声音不以为然,认为“那些国内闭门造车的批评家和感性主义者”对中国的实际情况缺乏第一手的认识^⑬。

真正惹恼中国人的,正是甘露德们将中国民众高涨的民族主义精神说成是受到苏俄煽动的产物,而完全无视中国维护国家主权的正当诉求。正如罗运炎在其英文著作《自内而起的中国革命》将不平等条约、列强将海关税和盐税作为抵押物、二十一条、国际共管论(the talk of international control)、外国人走私武器和毒品、上海和其他在租界出版的外文报纸中带有侮辱性的口吻等等,称为“令人气恼的事物”,并表示这些问题激发了中国人的民族自觉^⑭。

南京国民政府成立后,国民党对于外国在华所

办报纸和记者的管控加强。1929年,南京国民政府曾训令禁止邮局递送《字林西报》,据说此事与甘露德本人有密切关系^⑮。国民党系的英文双语刊物《中华实事周刊》(The China Truth)曾撰文,将甘露德称为“臭名昭著的在华‘死硬派’外国人(the notorious foreign die-hards)”。这份刊物具有鲜明的民族主义色彩,主要刊载国内外的政治新闻,立足于呈现中国的真实情况,澄清外界对中国的误解,促进中外亲善^⑯。其文中写道:“作为一份极端顽固的报纸,《字林西报》很乐意发表来自这位美国雇佣军(American Mercenary)的所有新闻,它们往往被中国官员和其他人反驳为‘明目张胆’的谎言。”该文还注意到甘露德不久后将要出版的另一本关于不平等条约的著作,书中鲜明地捍卫不平等条约、反对废约运动,因此该文作者建议南京国民政府禁止该书发行,因为它只会使“反对‘死硬派’的民族主义烈火更加炽烈地燃烧起来”^⑰。在国民党官方意识形态的宣传之下,甘露德的“死硬派”形象更加鲜明起来,成为抨击固守帝国主义立场的英文报刊的“靶子”。

七、结语

从甘露德的《中国之病》一书出版后引发的不同反响可以看出,在对华政策问题上,在华西人并非铁板一块。一方面,像李德立一类主张对华强硬的英侨与甘露德的言论颇为接近,认为中国的内乱是由于中国的诸多痼疾而起,民族主义运动是苏俄在中国煽动的“赤祸”,因而主张列强干涉中国革命。另一方面,窦乐安、赖发洛、雷穆森等人更倾向于由中国人自己寻求改变困局的办法。但是,从他们的言辞中可以看出,这背后固然有他们对中国的同情,但也不乏他们对五卅运动以后中国高涨的民族主义情绪的忌惮。无论支持甘露德与否,这些外国人都不同程度地流露出对甘露德书中激发中国民众更为强烈的反英情绪的担忧。

此外,自清末以来,那些来自西方的“他者”对于中国的观察及对中国民族性的概括常常引起中国人自身的主体性自觉。1901年,梁启超在《清议报》上连载译自日本《朝日新闻》的《中国人的气质》的长文。与此同时,梁启超也陆续在该报发表文章《论支那人国家思想之弱点》《积弱溯源论》《十种德性相反

相成义》等文,成为梁启超“新民”思想的发端。该书对于中国民族性的概括一直刺激着中国知识分子的神经,成为他们不断申说的改造国民性话语的参照系^⑧。夏晋麟受到甘氏《中国之病》一书的刺激,同题作文,试图从中国人的角度探求“中国的毛病在哪儿”,无疑也是由他者的书写反思中国的一种努力。然而,在高涨的民族主义情绪之下,相比罗运炎控诉甘露德辱华,进而要求将甘氏驱逐出国的论调相比,夏晋麟这样的声音则显得应者寥寥。

注释:

①林语堂:“序言”(Lin Yutang, "Prologue"),林语堂:《吾国与吾民》(Lin Yutang, *My Country and My People*),纽约:庄台公司1935年版,第11页。

②又译作甘露脱,或音译为吉尔伯·劳巴·古列、吉尔伯特等,在《字林西报行名录》中录有“甘露德(Kan-lu-teh),上海《字林西报》驻北京通讯员”,故本文采用此译法。

③魏舒歌著,魏舒歌、李松蕾、龙伟译:《战场之外:租界英文报刊与中国的国际宣传(1928-1941)》,北京:社会科学文献出版社2020年版,第41页。“死硬派”一词来源于“todie hard”,意为抵抗到死,原指英国保守党的极右翼,1911年他们誓死反对自由党政府提出的限制上议院权力的《议会改革法》,因而被称为“死硬派”,后引申为反动派中最顽固不化的、坚持反动主张、至死不变的集团和分子(参见《国际时事辞典》编辑组编:《国际时事辞典》,北京:商务印书馆1982年版,第237页)。本文中的“死硬派”是对20世纪20年代特别是五卅运动前后部分在华西人的指称,他们对中国抱有根深蒂固的偏见,固守外人在华特权地位,极力反对废除不平等条约运动。

④王伯衡:《中国之西字报》,黄天鹏编:《新闻学刊全集》,上海,光华书局1930年版,第142~143页。

⑤亦有译作《中国的毛病何在》《中国之乱源》者,本文出于贴近英文原意和历史的考虑,采用1926年6月2日《申报》报道中(详后)的译法。值得一提的是,英文书名中看似缺失的问号,实则是甘露德有意为之,目的是开门见山指出“中国之病”[参见毕可思:《英国在中国的社区、文化和殖民主义:1900-1949》(Robert Bickers, *Britain in China: Community, Culture and Colonialism 1900-1949*),曼彻斯特:曼彻斯特大学出版社1999年版,第28页]。

⑥胡适:“中国的文艺复兴”(Hu Shih, "The Renaissance in China"),《皇家国际事务研究所学报》(*Journal of the Royal Institute of International Affairs*)第5卷第6期(1926年11月),第279~280页。

⑦毕可思:《英国在中国的社区、文化和殖民主义:1900-1949》,第25页。

⑧费约翰认为,林语堂撰写《吾国与吾民》便是为了抵消该书所带来的外国对中国的负面印象(参见费约翰著,李恭忠等译:《唤醒中国:国民革命中的政治、文化与阶级》,北京:生活·读书·新知三联书店2004年版,第192页)。除了林语堂的《吾国与吾民》,汤良礼亦在其英文著作中明言,自己的著作是对甘露德等外国人士笔下的中国的一种反宣传(counter-propaganda)(参见李珊:《民族主义视角下的革命书写——浅析汤良礼撰英文著作〈反叛的中国〉》,《国际汉学》2017年第3期,第144页)。

⑨费约翰和毕可思在其著作中有所涉及(参见费约翰:《唤醒中国:国民革命中的政治、文化与阶级》;毕可思:《英国在中国的社区、文化和殖民主义:1900-1949》)。一些学者注意到甘露德与直系军阀之间的关系,如张功臣:《外国记者与北洋军阀》,《国际新闻界》1996年第1期,第70~74页;贾熟村:《白坚武与直系的内外交际》,《邵阳学院学报》2014年第2期,第108~113页等。此外,郑宝铭将《中国之病》作为20世纪20年代英国人最有代表性的关于中国的观察与论说之一,着重对甘氏的写作背景与动机等进行了考察,但较少涉及该书在中国引起的反响[参见郑宝铭:《中国的问题:1920年代英国人的中国书写》(Cheng, P. G., *The Problem of China: British Writing on China in the 1920s*),硕士学位论文,香港大学2011年]。

⑩“甘露德”(“Rodney Gilbert”),《北华捷报》(*The North-China Herald*)第179卷第3212期,1929—03—02,第345页。

⑪“被提名哥伦比亚的职位:甘露德将出任新闻学院客座讲师”(“Named to Columbia Post: Rodney Gilbert to be Visiting Lecturer in Journalism School”),《纽约时报》(*The New York Times*),1943—01—28,第17页;葛思恩:《回忆重庆新闻学院》,《新闻研究资料》1981年第4辑(总第9辑),第153页。

⑫《前鋒论坛主笔甘露德将返美》,贵阳《中央日报》,1945年9月28日,第3版。

⑬“专栏作家甘露德去世”(“Rodney Gilbert, Columnist, Dies”),《纽约时报》,1968—01—12,第34页。

⑭顾德曼:“半殖民主义、跨国网络和民国初年上海的新闻流动”(Bryna Goodman, "Semi-Colonialism, Transnational Networks and News Flows in Early Republican Shanghai"),《中国评论:大中华地区跨学科期刊》(*The China Review: An Interdisciplinary Journal on Greater China*)第4卷第1期(2004年春),第77页。

⑮《社论》("Editorial Article"),《密勒氏评论报》(*Millard's Review of the Far East*)第8卷第8期,1920—07—24,第415页。

⑯陈玉玠译:《吴佩孚与英美》,《近代史资料》1983年第2期(总第52号),第117页。

⑰杜春和、耿来金整理:《白坚武日记》,1919年4月24日,南京:江苏古籍出版社1992年版,第192页。Roy S. Anderson,

中文名孙明甫,东吴大学首任校长孙乐文(David Lawrence Anderson)次子,曾任职美孚石油公司,并以“Bruce Baxter”的笔名为《字林西报》撰稿,是美国驻华公使芮恩施(Paul S. Reinsh)的得力助手。1923年临城大劫案发生时,他作为中国政府的代表与孙美瑶谈判,1925年死于肺结核(参见顾德曼:“半殖民主义、跨国网络和民国初年上海的新闻流动”,第72页)。

⑮“民主捍卫者吴佩孚将军:来自甘露德的重要采访”(“Gen. Wu Pei-fu Democracy's Champion: An Important Interview from Rodney Gilbert”),《北华捷报》第136卷第2765期,1920—08—07,第344页。

⑯如1921年11月,吴佩孚驻兵洛阳时,甘露德陪伴美国驻华公使馆海军参赞前往龙门游览,白坚武向其询问北京时局和银行团的消息,甘露德则与其谈论张作霖的外交手腕,并忠告吴佩孚注重外交(参见杜春和、耿来金整理:《白坚武日记》,1921年11月18日,第284页)。

⑰吴应銑:《近代中国的黠武主义:吴佩孚的事业1916—1939》(Odoric Y. K. Wou, Militarism in Modern China: the Career of Wu Pei-fu, 1916—39),道森:澳大利亚国立大学出版社1979年版,第183、189页。

⑱甘露德:“冯玉祥的政变及之后:北京近况”(Rodney Gilbert, “Feng Yu-Hsiang's Coup and After: Recent Events in Peking”),《北华捷报》第153卷第2991期,1924—12—06,第396页。

⑲“朱尔典致寇松(1920年2月21日)”(“Sir J. Jordan to Earl Curzon, Feb. 21, 1920”), E. L. 伍德沃德、洛昂·巴特勒编:《英国外交政策文件1919—1939》(E. L. Woodward and Rohan Butler, eds., Documents on British Foreign Policy 1919—1939)第1系列第6卷,第750号, F567/2/10, 第1006页;英国海外政策文件数据库 <https://www.proquest.com/dbpo/docview/1922974777/abstract/29F679AC57CD428BPQ/1?accountid=41097>, 发布时间:2017年8月9日。

⑳王树槐:《庚子赔款》,台北:“中研院”近代史研究所1994年版,第437~438页。

㉑甘露德:“庚子赔款:英国的份额将用来做什么”(Rodney Gilbert, “The Boxer Indemnity: What Will Be Done with Britain's Share”),《北华捷报》第146卷第2902期,1923—03—24,第817、821页。

㉒该委员会于1921年9月30日由英国外交部设立,英国驻华公使朱尔典任主席,其目的是就英国朝野中退还庚款用于资助中国教育的呼声进行考察(参见王树槐:《庚子赔款》,第427~428页)。

㉓“威尔斯利致R.P.斯科特(1923年10月26日)”(“Sir Victor Wellesley to R. P. Scott, Oct. 26, 1923”),英国国家档案馆藏,英国外交部档案,档号:FO371/9179,第15页。

㉔“阿丁顿关于中国局势的报告(1926年8月1日)”(“Lord

Addington's reports on Situation in China, Aug. 1, 1926”),英国国家档案馆藏,英国外交部档案,档号:FO371/11672,第136~137页。

㉕“格沃特金笔记(1926年5月11日)”(“Notes of Asheton-Gwatkin, May 11, 1926”),英国国家档案馆藏,英国外交部档案,档号:FO371/11672,第134页。

㉖霍德进(Henry Theodore Hodgkin, 1877—1933),英国公谊会传教士,1905年来华,1910年创建唯爱社(Fellowship of Reconciliation),强调人类一体性,主张爱是克服邪恶的有效力量,反对战争,1922年,霍德进利用来华参加世界基督教学生同盟会议之机,与吴耀宗创建中国唯爱社。

㉗霍德进:“甘露德先生与万县事件”(Henry T. Hodgkin, “Mr. Gilbert and the Wanhsien Affair”),《北华捷报》第161卷第3087期,1926—10—09,第77页。

㉘②甘露德:《中国之病·序言》(Rodney Gilbert, What's Wrong with China, “Pre face”),伦敦:约翰·默里公司1926年版,第6、7页。

㉙甘露德:“给约翰·默里的信”(Rodney Gilbert, “Letter to John Murray”),苏格兰国家图书馆藏,约翰·默里档案,转引自郑宝铭:《中国的问题:1920年代英国人的中国书写》,第55页。

㉚甘露德:《中国之病》,第14页。

㉛参见萨义德著,王宇根译:《东方学》,北京:生活·读书·新知三联书店2007年版,第45页。显然这里所说的所谓“自己认为最好、最符合他们利益的东西”是指在殖民者看来东方民族在其历史进程中熟悉的统治与被统治的模式。

㉜③④⑤⑥⑦⑧⑨⑩⑪⑫⑬⑭甘露德:《中国之病》,第15、18~19、30、31、33、65、67、79、84、92~93页。

㉝⑬⑭威廉·冯·洪堡特著,姚小平选编译注:《洪堡特语言哲学文集》,北京:商务印书馆2011年版,第119、132~133、174、185、187页。

㉞⑬⑭⑮⑯⑰⑱⑲⑳㉑甘露德:《中国之病》,第125、155、157、172、178、202、203、256、257、265、272、45页。

㉟②大卫·贝尔著,成沅一译:《发明民族主义:法国的民族崇拜:1680—1800》,杭州:浙江大学出版社2020年版,第258~263页。

㊱甘露德:《林蟒之莽》(Rodney Gilbert, The Indiscretions of Lin Mang),伦敦:约翰·默里公司1929年版,第305~306页。

㊲①②③甘露德:《中国之病》,第267、275、199页。

㊳罗斯塔通讯社,1918年成立,1925年改组为苏联通讯社,即塔斯社。

㊴甘露德:《中国之病》,第262~263页。甘露德对于苏俄和共产国际1920年前后在华活动的记述值得注意。除霍多罗夫外,他还提到在任何人都并未重视苏俄宣传时,达尔塔通讯社特派记者便在广东活动,此人应为米诺尔(K.A. 斯托扬诺维奇)参见:《斯托扬诺维奇给某人的信》,中共中央党史研

究室第一研究部译:《联共(布)、共产国际与中国国民革命运动(1920-1925)》,北京:北京图书馆出版社1997年版,第43页;石川祯浩著,袁广泉译:《中国共产党成立史》,北京:中国社会科学出版社2006年版,第93~94页]。

⑤甘露德:《中国之病·序言》,第6页。

⑥甘露德:“给约翰·默里的信”(Rodney Gilbert, "Letter to John Murray"),苏格兰国家图书馆藏,约翰·默里档案,转引自郑宝铭:《中国的问题:1920年代英国人的中国书写》,第54页。

⑦参见查尔斯·海弗德:“中国人与美国人的性格:明恩溥与他的中国著作”(Charles Hayford, "Chinese and American Characteristics: Arthur H. Smith and His China Book"),白威淑珍、费正清编:《基督教在中国:早期新教传教士的书写》(Suzanne Wilson Barnett and John King Fairbank eds, Christianity in China: Early Protestant Missionary Writings, Cambridge),剑桥、马萨诸塞州:哈佛大学出版社1985年版,第161~163页。

⑧明恩溥著,佚名译,黄兴涛校注:《中国人的气质》,北京:中华书局2006年版,第234页。

⑨甘露德:《中国之病》,第295页。

⑩窦乐安(John Darroch, 1865-1941),苏格兰人,1887年来华在山西传教。1902年山西大学成立后,他负责该校设在上海的译书院(参见中国社会科学院近代史研究所翻译室编:《近代来华外国人名辞典》,北京:中国社会科学出版社1981年版,第101页)。

⑪窦乐安:“甘露德关于中国的书”(John Darroch, "Mr. Rodney Gilbert's Book on China"),《北华捷报》第159卷第3067期,1926-05-22,第377页。

⑫“新著初印象”(“First Impressions of New Books”),《大陆报》(The China Press),1926-05-23,C版块第8页。

⑬“甘露德先生写了一本书!”(“Mr. Rodney Gilbert Writes a Book!”),《密勒氏评论报》(The China Weekly Review)第36卷第13期,1926-05-29,第339页。

⑭赖发洛(Leonard Arther Lyall, 1867-1940),英国人,1886年来华任中国海关帮办,曾在云南、湖南、上海等地任税务司,译有《论语》《中庸》《孟子》(参见中国社会科学院近代史研究所翻译室编:《近代来华外国人名辞典》,第297页)。

⑮“赖发洛论英中关系”(“Mr. L. A. Lyall on Anglo-Chinese Relations”),《北华捷报》第161卷第3093期,1926-11-20,第352页。

⑯冯兆基:《帝国撤退的外交:英国对南方中国的政策(1924-1931)》(Edmund S. K. Fung: The Diplomacy of Imperial Retreat: Britain's South China Policy, 1924-1931),香港:牛津大学出版社1991年版,第94页。

⑰罗运炎(1890-?),字耀东,江西九江人,1907年毕业于九江南伟烈书院,1909年赴美国留学,先后求学于鲍尔温学院、雪城大学,获哲学博士学位,1914年回国后历任南伟烈书

院教授,江西省督军署顾问,帮办九江交涉事宜,美以美教会总编辑长,中华基督教徒文学会副会长,苏州大学讲师;1929年5月,罗氏出任南京国民政府禁烟委员会委员,1933年1月,任立法院第四届立法委员,1942年6月,连任立法院立法委员(参见徐友春主编:《民国人物大辞典》,石家庄:河北人民出版社1991年版,第1636页)。

⑱《罗运炎主张取缔外人在华言论》,《申报》,1926年6月2日,第13版。

⑲陈雁:《北洋外交的领军者颜惠庆》,福州:福建教育出版社2015年版,第180~182页。

⑳需要指出的是,作为北京政府直奉合作时期执掌外交的主要人物,颜惠庆是熟悉甘露德的,就在1926年4月20日颜氏的日记中还记有“甘露德评论日本在满洲的政策、赤祸以及张作霖的后台”(参见上海市档案馆译:《颜惠庆日记》第2册,北京:中国档案出版社1996年版,第327页)。

㉑“‘中国之病’:中国宣传家要求将甘露德先生驱逐出境”(“What is Wrong with China: Chinese Publicist's Demand that Mr. Rodney Gilbert Shall be Expelled from the Country”),《字林西报》(The North-China Daily News),1926-06-03,第1页。

㉒罗运炎:“中国之病”(R. Y. Lo, "What is Wrong with China"),《字林西报》,1926-06-04,第4页。

㉓“朱兆莘先生与鸦片”(“Mr. Chu Chao-Hsin and Opium”),《字林西报》,1926-06-05,第6页。

㉔“罗博士与甘露德先生”(“Dr. Lo and Mr. Gilbert”),《字林西报》,1926-06-05,第6页。

㉕鲁弗斯:“中国之病”(Rufus, "What's Wrong with China"),《字林西报》,1926-06-05,第4页。

㉖罗运炎:“罗博士与甘露德先生”(R. Y. Lo, "Dr. Lo and Mr. Gilbert"),《字林西报》,1926-06-07,第4页。

㉗本报编辑:“罗博士与甘露德先生”(The Editor, "Dr. Lo and Mr. Gilbert"),《字林西报》,1926-06-07,第4页。

㉘李德立(Edward Selby Little, 1864-1939),英国人,在上海经商,曾三次任上海公共租界工部居董事,1911年辛亥革命时曾促成清政府与革命党在上海谈和,1921-1923年为澳大利亚驻华商务代表(参见中国社会科学院近代史研究所翻译室编:《近代来华外国人名辞典》,第289页)。

㉙李德立:“中国之病”(Edward S. Little, "What's Wrong with China"),《北华捷报》第159卷第3071期,1926-06-19,第548页。

㉚罗运炎:“中国之病”(R. Y. Lo, "What's Wrong with China"),《北华捷报》第159卷第3071期,1926-06-19,第548~549页。

㉛李德立:“中国之病”(Edward S. Little, "What's Wrong with China"),《字林西报》,1926-06-21,第4页。

㉜罗运炎:“罗博士与甘露德先生”(R. Y. Lo, "Dr. Lo and

Mr. Gilbert"),《字林西报》,1926—06—22,第4页。

⑭吴义雄:《信耶稣的国民:民族主义与1920年代中国基督徒的身份问题》,《安徽大学学报》2013年第5期,第104~113页。

⑮雷穆森:《中国国是实况·序言》(O. D. Rasmussen, What's Right with China·"Preface"),上海:商务印书馆1927年版,第x页。

⑯雷穆森:《中国国是实况·介绍》(O. D. Rasmussen, What's Right with China·"Introduction"),第xiii页。

⑰⑱雷穆森:《中国国是实况》,第17、47页。

⑲甘露德:《中国之病》,第211页。

⑳雷穆森:《中国国是实况·献词》(O. D. Rasmussen, What's Right with China·"Dedication")。

㉑伍德海:“一种‘上海心理’及其矛盾之处”(H. G. W. Wood head, "A 'Shanghai Mind' and Its Contradictions"),《北华捷报》第165卷第3148期,1927—12—10,第467页。

㉒雷穆森:“雷穆森先生的回应”(O. D. Rasmussen, "Mr. Rasmussen Relies"),《北华捷报》第165卷第3148期,1927—12—10,第468页。

㉓温源宁:“雷穆森著《中国国是实况》”(Yuan-Ning Wen, "What's Right with China by O. D. Rasmussen"),《太平洋事务》(Pacific Affairs)第1卷第2期(1928年6月),第37页。

㉔夏晋麟(1894—?),字天长,近代中外关系史学者与外交官员。1914年赴英国留学,先入苏格兰格拉斯哥大学,后入爱丁堡大学,获哲学博士学位。1922年归国,任督办收回威海卫事宜公署秘书。1923年起,任私立上海南方大学文科主任、教授,省立上海商科大学教授。1927年任南京国民政府外交部秘书,后出掌上海麦伦书院(Medhurst College),任私立东吴大学法学院教授。1931年,任驻英国使馆一等秘书。1934年归国,任南京国民政府立法院立法委员(参见徐友春主编:《民国人物大辞典》,第661页)。

㉕夏晋麟:“中国之病:一个中国人对其国家的看法”(Ching Lin-Hsia, "What is Wrong with China: A Chinese View of His Country"),《北华捷报》第160卷第3076期,1926—07—24,第185页。按,该文署名为“Ching Lin-Hsia”应是笔误,文中所登载的夏晋麟肖像则标注为“Dr. Ching-Lin Hsia”。

㉖夏晋麟:“中国之病(之二):弃孔子之悲剧”(Ching-Lin Hsia, "What is Wrong with China(Ⅱ): the Tragedy of Dropping Confucius"),《北华捷报》第160卷第3077期,1926—07—31,第236页。

㉗夏晋麟:“中国之病(之四):负债之路”(Ching-Lin Hsia, "What is Wrong with China(Ⅳ): The Load of Debt"),《北华捷报》第160卷第3079期,1926—08—14,第332页。

㉘夏晋麟:“中国之病(之五):个人贫困”(Ching-Lin Hsia,

"What is Wrong with China(Ⅴ): Individual Poverty"),《北华捷报》第160卷第3080期,1926—08—21,第378页。

㉙夏晋麟:“中国之病(之三):需要新制度或新精神”(Ching-Lin Hsia, "What is Wrong with China(Ⅲ): A New System or a New Spirit Needed"),《北华捷报》第160卷第3078期,1926—08—07,第284页。

㉚邵芾棠:“甘露德先生与罗博士”(F. D. Z., "Mr. Gilbert and Dr. Lo"),《北华捷报》第160卷第3074号,1926—07—10,第76页。关于邵芾棠的身份,可参见李珊:《〈北华捷报〉上的中国投书人——国民革命时期民族主义的对外表达》,《近代史研究》2018年第4期,第27~29页。

㉛费正清著,张理京译:《美国与中国》,北京:世界知识出版社1999年版,第302页。

㉜白鲁恂:《中国人的政治心理(修订版)》(Lucian W. Pye, The Spirit of Chinese Politics: New Edition),剑桥、马萨诸塞州:哈佛大学出版社1992年版,第107页。

㉝甘露德:《中国之病》,第263页。

㉞辛博森(Bertram Lenox Simpson, 1877—1930),英国人,1911年辛亥革命后任伦敦《每日电讯报》(The Daily Telegraph)驻北京记者,曾被黎元洪聘为总统府顾问,张作霖顾问,中原大战中曾协助阎锡山接收津海关,阎反蒋失败后,辛交出海关,11月遇刺身亡(参见中国社会科学院近代史研究所翻译室编:《近前来华外国人名辞典》,第440页)。

㉟辛博森:《中国为什么看中了赤色》(Putnam Weale, Why China Sees Red),伦敦:麦克米伦公司1926年版,第181页。

㊱李德立:“李德立式的‘死硬派’”(E. S. Little, "Die-hards' of the E. S. Little Type"),《字林西报》,1927—05—14,第4页。

㊲㊳伍德海:《中华民国之真相》(H. G. W. Woodhead, The Truth about the Chinese Republic),伦敦:赫斯特与布莱克特有限公司1925年版,第265、10~11页。

㊴罗运炎:《自内而起的中国革命》(R. Y. Lo, China's Revolution from the Inside),纽约:阿宾登出版社1930年版,第40~41页。

㊵赵敏恒著,中国太平洋国际学会编译:《外人在华新闻事业》,上海:中国太平洋国际学会1932年版,第40页。

㊶《中华民国外交部长王博士正廷来函》(1929年3月25日),《中华实事周刊》第1卷第20期,1929年8月,第ii页。

㊷“甘露德心怀叵测”(Rodney Gilbert Has An Ax to Grind),《中华实事周刊》第1卷第20期,1929年8月,第2页。

㊸参见黄兴涛:《美国传教士明恩溥及其〈中国人的气质〉——一部“他者”之书的传播史与清末民国的“民族性改造”话语》,明恩溥著,佚名译,黄兴涛校注:《中国人的气质》,第25~45页。